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其意义

现代的国家总是建立在一系列被建构出来的共同感基础之上的，比如说共同的价值观和法律规范、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疆域、共同的大众文化以及共同的经济基础等。因此，安东尼·史密斯才说，“现代国家将共同体凝聚的重点从血缘和文化维度转向地域的、教育的和法律的维度，但它却始终和古老的民族记忆保持着联系”<sup>[1]</sup>。有学者亦提出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民族”是指其每一个成员共享一个历史疆域、共同的传说、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责任和权利的人群。<sup>[2]</sup>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归属在现代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概念，以至于“在现代世界每个人，就像他或她拥有一个性别一样，都能够、应该并且将会拥有一个

---

[1] Anthony D. Smith. A Europe of Nations or the Nation of Europe? [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3, 30 (2) : 35.

[2] [英]爱德华·莫迪默.人民·民族·国家[M].刘泓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30.

民族成员的身份”<sup>[1]</sup>。

当今世界各国大多数都由超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所构成，绝大多数国家通常都是由一个或少数几个民族体占主导地位，被称为主体民族；而其他的民族则处于从属地位，被称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无疑是一个相对概念，与“多数”或“主体民族”相对应，这种对比通常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数量上的对比，而是和群体占有的社会资源有关。在这些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中，国家认同问题总是与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构成了一种能够动员人心的力量。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互动不仅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且如果两者能够实现彼此互为补充、协调共存时就会给国家增强团结的力量，使得国家共同体得到巩固。反之如果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受到削弱、被拆散或者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就会对国家认同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国家共同体就会陷入认同危机之中。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汉族人口为12.26亿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4亿人，占8.49%。由此可见，有关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

[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 [M]. 吴睿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25.

## 一、选题背景

“民族”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它通常不完全取决于客观的因素，比如血统。它更多地取决于人类个体的心理认同，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提到的：民族只有被主观认定具有共同特征时，才会成为“群体”。<sup>[1]</sup>

在当代世界中，认同问题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并成为人们政治、文化以及心理上的主流议题。所谓认同，指的是“个体将自我身份同另外某些身份相融合的过程”。<sup>[2]</sup> 民族认同“作为一种对于相同文化的认同，不仅使本民族的成员能够明白其自身所属，同时还能为民族成员提供一种对于共同的历史的归属与认同。此外，民族认同还为本民族群体成员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有意义的背景”<sup>[3]</sup>。民族认同在现代化建设初期起着积极的作用，相同的语言和文字在民众中培育出一种“我们”感，从而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运作提供了前提。卡拉（Carla）和雷格奈德（Reginald）把民族认同看作是民族成员对所属民族群体的态度、信念以及对自身民族成员身份的认可，并认为群体的认同包括民族认识、民

---

[1] [德]马克思·韦伯. 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M]. 李强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105.

[2] [美]约翰·费斯克. 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第二版) [M]. 李彬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127.

[3] David Miller. On Nationalit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89.

族态度、民族行为和民族归属感这几个基本要素。<sup>[1]</sup>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对于特定的某个民族成员而言，其对于所属民族群体身份认同通常来源于以下方面：一是其内在的源自于血缘、语言、家庭、价值观以及所属社会群体的影响中的一种自我认同意识；另一方面则涉及来自于群体之外的他人的影响，通过对非本民族群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观念、价值倾向、风俗习惯等差异的比较和感知，民族认同以文化的差异性作为边界得以界定。在此意义上，特定的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的理解和认同并不是先验的，而是有一个习得的过程，或称社会化的过程。在民族群体中，成员可以通过家庭、社会教育、日常行为等方式了解民族历史，学习这些民族文化价值和规范形成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不过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民族成员，尤其是青年一代，当他们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的时候，大众媒介的进入对于他们如何界定并形成对自身所属群体的身份认同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时民族成员对民族身份认知的建立，更多的取决于对他者与自身的观照之上，这就是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建立过程，在此过程之中大众传媒无疑起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斯图尔特·霍尔由此提出了大众传媒的赋予意义之功能，

---

[1] Carla J., Reginald J. Racial Identity, 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areer in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J].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8, 26 (1) : 76.

建构主义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所有人类感知的社会真实都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媒体的建构是其中重要部分。李普曼甚至认为，个人仅能通过大众媒介所建构的情景来解释和描绘世界。<sup>[1]</sup>也就是说，传媒参与甚至主导了现代人意义建构的过程。在关于民族的意象形成的过程中，大众媒介扮演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传媒再现媒介事件及其建构的过程可以窥视出传媒在叙述的历史过程中对民族认同的建构。或许像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媒体很多时候可能不仅不能客观反映现实，而是在某些程度上塑造现实。<sup>[2]</sup>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媒介只是在虚构和想象现实，它既不建构也不反映现实，媒介同时在重新定义和不断生产着现实。<sup>[3]</sup>

与此同时，“媒介”也被认为是民族意识、文化认同正当化的重要“管道”。媒介象征着一种符号权力，可以控制并赋予民族关系定义，拥有媒介就是拥有权力，也就是拥有民族关系的解释权。<sup>[4]</sup>少数民族群体的需求显示了大众媒介在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过程中的问题。因此，近年来的传播研究逐渐将传播与认同的关系架构在文化的情境中，尝试从生

---

[1] [美]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 [M]. 阎克文等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6.

[2]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M]. 赵旭东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29.

[3] 潘知常. 新意识形态与中国传媒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4）：25.

[4] 孔文吉. 原住民新闻与汉人新闻媒体 [J]. 山海，1994（2）：82.

活经验以及公众文本、事件与舆论等途径来分析传播与认同的形成。<sup>[1]</sup>传播学者英尼斯曾探讨文化认同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关系，他强调文化认同对于建立自我形象而言意义重大，少数民族为了统一的自我形象的建立，需要从媒介中持续而规律地感知其文化。弱势民族如果缺乏接近媒介的权利，将会最终导致其成员个人认同危机、民族文化自尊的丧失。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以及多元文化的社会，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彼此接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过去主流媒体对于少数民族的形象建构与塑造往往充满刻板印象与偏见，致使少数民族成为主流社会文化中的“他者”，媒体再现下的少数民族形象往往对于受众造成主流同化效果，使得一般大众对于少数民族的看法与主流媒体报道趋于一致。有鉴于此，本研究根据刻板印象、媒介建构、他者再现和框架理论，采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随机抽样抽取三家主流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贵州日报》，探讨它们自1978年至2010年长达33年间如何再现少数民族形象及其对少数民族认同产生的影响，关注在有关少数民族的报道中，大众媒介描绘了怎么样的少数民族的图像？旨在从“报道了什么”和“如何报道”两个层面来进行考察主流媒体如何建构和再现少数民族的形象。

与此同时，结合相关资料进一步研究主流媒体少数民族

---

[1] 转引自谢伟妹. 公视原住民记者观点之探究[J]. 台大新闻论坛, 1998 (5) : 62.

形象建构对于少数民族形成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进而研究少数民族形象建构、身份认同议题与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能够进一步引导主流媒体实现对少数民族报道的全面和客观，这不仅有利于公众对少数民族形成正确的认识，也有利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实现，从而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构。

## 二、研究的意义

### （一）理论意义

目前对于新闻报道中少数民族形象建构以及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传播学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尚未有专著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仅存在一些学术文章，而且分析也缺乏理论支撑，仅仅停留在现状描述的层面。尽管对于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较多，但多数的研究集中于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因此，通过本研究的梳理和总结，能够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从横向和纵向上来对主流媒体少数民族形象建构进行探讨，一定程度上理清主流媒体在少数民族报道中的偏向与不足，对于加强民族题材新闻报道，促进民族新闻报道技巧，加强民族宣传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针对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研究同样可以推广到少数民族的形象建构与身份认同研究中，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媒介增进有效传播、通过大众媒介缓和社会矛盾、构建

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本课题系统的理论探讨，大量的实证研究及对比分析同时也可为少数民族传播的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以及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划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丰富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 （二）实际意义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时常爆发冲突，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缺乏客观的报道，由于媒体报道中存在的偏见，导致了主流社会对于少数民族体的刻板印象，这些偏见会导致少数民族体出现不满或敌意情绪，当这些情绪无法宣泄时，就只能压抑于内形成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研究对于少数民族报道的偏见根源也许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

本研究从主流媒体对于少数民族的报道研究入手，通过对近三十年的数据进行跟踪分析，试图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以及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形象建构的变化趋势，提出主流媒体对少数民族报道应该遵循的客观和多样化的建议与策略，促进少数民族平等地享有被报道的权利，实现民族身份认同促进社会和谐。

另一方面，大量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过程也忽视了少数民族族体本身的诉求，如果少数民族长期在新闻报道中无法得到客观的报道，无法形成正确的身份认同，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地区的安全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反之，如果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介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报道时能够通过报道来消除少

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误解与隔阂，满足少数民族体的需求，建立起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从长远来说将会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和平共处。

## 第二节 研究实施情况

### 一、分析对象

本研究以主流报纸特别是党报为研究范围，主要是考虑到与市场化的都市类报纸不同，党报的报道选题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加兼顾到少数民族群体。选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贵州日报》这三份报纸的原因是，首先就《人民日报》而言，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不仅是全国最有影响力、最具有权威性的报纸，同时其中所刊登的少数民族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作为党的喉舌的传统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总的报道态度，同时《人民日报》的态度对其他媒体甚至是各级政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考虑到抽样和研究的代表性，将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的省级党报进行分组抽样，分为两个组，一个组是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 10 个少数民族分布较多的省份：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从中以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一个省份，能够反映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主流报纸是如何报道少数民族的。另外将其他 24 个省级行

政区分为一组，随机抽样抽取一份报纸，试图对比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主流报纸又是如何对少数民族进行报道的。

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的报纸，随机抽取的是《贵州日报》。该报作为贵州省委机关报创刊于新中国成立时，是贵州省极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党报，覆盖面广，2010年发行量接近50万份，在贵州地区以及周边省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贵州日报》作为党的喉舌、传统大众传媒担负着宣传民族政策，稳定民族地区舆论导向的重要宣传任务。而非少数民族聚居省份的报纸，随机抽取的则是《北京日报》。《北京日报》创刊于1952年10月1日，为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是首都地区日报类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为1881.1万人，占95.9%；各少数民族人口为80.1万人，占4.1%，其中满族、回族、蒙古族是北京地区分布人数最多的三个少数民族。

## 二、分析框架

针对一个分析单位（即一篇有关少数民族的报道），主要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报道呈现出来的外在信息，包括报道的时间、报道标题、报道篇幅、报道体裁、信息来源、报道版面位置及其大小等；二是报道的具体内容，涉及报道的主题、报道的主体、报道区域、报道立场以及报道时机；三是报道所呈现出来的少数民族整体形象，包括文化形象、人格特征、民族关系等；四是报道策略，包括叙述形式

和叙述策略。

### 三、样本抽取

2000 年，赖斯（Lacy）的研究曾发现从 5 年的日报中抽取 9 个构造周足以预测总体均值。<sup>[1]</sup> 参考这一研究结果，本研究针对 197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共 32 年间的研究对象分为六组，考虑到样本的时效性，前两组为六年一组，后四组为五年一组。利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每一组中抽取 9 个构造周，一共是 378 天的报纸作为研究对象。针对被抽取出来的报纸，按照标题中含有“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某某族”或者具有民族特色的人名地名等作为关键词，检索有关少数民族的报道。

表 1-1 抽样结果分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份数 (天)	10	14	8	11	9	11	10	11	7	13	10	12	15	13	12	15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份数 (天)	8	15	9	11	14	14	14	11	11	8	19	21	11	9	12	10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1] Lacy, S., Riffe, D., Stoddard, S. Sample Size for Newspaper Content Analysis in Multi-year Studies[J].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0, 78 (4) : 836.

其中，共抽样出与少数民族有关报道《人民日报》344篇、《北京日报》94篇、《贵州日报》204篇作为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对象。

### 第三节 主要研究结果

本文通过对三份主流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贵州日报》33年来关于少数民族报道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考察它们在有关少数民族报道中所建构的少数民族形象及其建构策略，主要发现有：少数民族报道总体数量偏少；报道侧重于告知信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内容是有关少数民族报道的重中之重；报道态度总体上呈现“中立”为主的立场；少数民族报道关注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风俗仪式等方面；多采用事实叙述的方式，采用肯定成就、民族团结、帮助扶持等策略来进行报道；少数民族在报道中总体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同时少数民族在报道中呈现出总是处于弱势的，需要外界的帮助和扶持的形象。

#### 一、主要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法分析三家主流报纸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3年间（1978年12月3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如何再现少数民族形象。研究结果显示，在报道

主题、报道区域、被报道对象身份、少数民族主要形象呈现、少数民族报道策略等分析类目上，三家报纸各有不同的表现，如下：

(1) 报道主题：三份报纸报道数量最多的议题分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类，但是在排序上有所区别：《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报道数量最多的是政治方面的选题，其次是经济类议题，而《贵州日报》则更为关注文化艺术方面的议题。

(2) 报道区域：《人民日报》少数民族报道涉及最多的地区是西藏，其次是新疆以及云南；《北京日报》报道最多的是北京地区，其次是西藏和新疆；《贵州日报》则立足于本省，报道的大多都是本省各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少数民族新闻。

(3) 被报道对象身份：《人民日报》涉及最多的民族为藏族，其次是维吾尔族，被报道提及的少数民族为 45 个。《北京日报》报道涉及最多的民族为藏族，其次是回族和蒙古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地区人数最多的满族在抽样样本中却没有一篇报道涉及。《贵州日报》报道涉及最多的民族为苗族、布依族和侗族。

(4) 少数民族主要形象呈现：《人民日报》在少数民族报道时，特别强调“民族团结”和“民族自治”，所呈现出来的少数民族形象主要是拥护党、各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的形象。《北京日报》则特别强调少数民族的“多彩民族文化形象”和“受到外界的帮助扶持的形象”。《贵州日报》在对

少数民族进行报道时，更关注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5) 少数民族报道策略：在对少数民族进行报道时，三份报纸基本都将少数民族视为“弱势”地位的群体，无论是文明、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发展，少数民族都是处于“受到帮助的地位”。不过《人民日报》主要采取“肯定成就”的叙事策略，而《北京日报》和《贵州日报》则更加倾向于采用“文化吸引”作为叙述的主要策略。

## 二、小结

在主流媒体少数民族形象呈现方面，虽然有一些研究针对主流媒体少数民族形象呈现进行过论述，但是此类研究一方面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时间较短，另外一方面没有关注少数民族形象呈现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本研究发现，主流媒体的少数民族报道带有“保守”的特点，尽管负面报道不多，但是对少数民族多以猎奇的视角审视，客观上来说会导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贬抑。而对于少数民族受众来说，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年轻人从原来的聚居地迁移到了城市，离散的居住情况使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自身所属民族的认知也更多受到大众媒体报道的影响。因此，大众媒介的刻板化报道会影响少数民族受众对于自身民族认知的偏差，从而导致身份认同困境的出现。

多元文化观点已经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多民族社会冲突的政策趋势，我国也不应该例外，但是大众传媒对于少数

民族的报道长期以来充满刻板印象和偏见。大量的研究证明，要改善这个现象，应该整合多元文化的精神，从媒介的结构多元化和内容多元化来审视媒体系统是否符合多元化的要求。本研究从主流媒体少数民族报道入手，通过内容分析以及文本分析的方法检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三家主流党报的少数民族报道，分析它们的少数民族报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的建议，强调主流媒体少数民族报道要深入细致的挖掘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及其民族文化，要纳入多元文化的观点，在报道中尽可能充分的展现少数民族，贴近事实，以便公众和少数民族本身形成正确的认知。针对不同的少数民族，需要在报道的同时考虑少数民族文化信仰的特点、少数民族对于主流社会的介入程度、少数民族民众个人自由以及选择的基本权利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新闻媒体报道少数民族相关议题时候的参考框架。

从多文化主义的观点出发，本研究重新检讨大众传播的基本目标、功能与政策研究等，并说明传统的传播理念较忽视对于少数民族的保障，而一般大众传播往往沦为维护主流社会的工具，媒体的所有权、雇佣机会与文化再现等等均不利于少数民族；媒体的监督、教育与文化、娱乐等功能也都成为强化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依靠。唯有发展多文化主义的传播目标与政策研究，才能修订相关法规，保障少数民族相应权利以及免于刻板形象的媒体再现，促进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尊重与和谐相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回顾

在我国学术界有关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形象呈现的研究目前尚未成为学术热点，学者们对于大众媒介这种司空见惯的存在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形象呈现、少数民族认同、民族治理的关系还缺乏足够的问题意识。

而大众媒介在报道少数民族时只偏重过程的描述，对事件的原因以及背后牵连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深层因素则未作深度以及详细的探讨。同时，主流媒体在长期的市场化竞争影响下对于少数民族相关议题的报道，不仅在数量上明显不足，内容上则多偏向庆典、嘉年华及歌舞升平式的刻板印象，对于少数民族权益与福利或者其切身相关的问题的报道较少，框架式的报道限制了社会大众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同时也模糊了大众对少数民族相关议题的关注。

本研究针对三份主流报纸：《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贵州日报》，探讨它们自 1978 年至 2010 年 33 年间如何再现少数民族形象及其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关注在有关少数民族的报道中，大众媒介描绘了怎么样的少数民族的图像，以及这些图像对公众形成对少数民族的认知有何影响，进而探讨其对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影响。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在探讨主流报纸少数民族形象呈现及其对少数民族个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问题时，一些概念必须先加以界定和说明，例如：民族、族群、少数民族、民族认同、族群认同等容易混淆的概念，明晰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对少数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的开展。

“族”这个字原来是由旗部和矢部构成的，是指拥有标志的狩猎或武力集团。古代多指以氏族、邻近部族为核心，并且有旗帜标示的武力政治集合。后来逐渐演变为指家族或宗族领域，进而指特定亲属关系。今天我们使用民族、少数民族等概念则是主要是受到 19 世纪后的西方和日本的影响。

### 一、族群、民族与少数民族

#### （一）族群

族群 (ethnic) 一词源于希腊词 (ethnikos)，它的原意是人民 (people)、阶级 (caste) 或部落 (tribe)。德·沃斯认为：“一个族群是一些自觉成群的人们，他们共同持有一组不与和他们相接触的他人分享的传统，这些通常包含传统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及语言，一种历史延续感及共同的血源